

试论民粹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转化和演变

林美钦

(莆田学院 北区图书馆 福建 莆田 351100)

摘要:民粹主义一开始进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就被紧密联系在民族命运和革命前途之上。在整个现代文艺思潮中,随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确立,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文艺思潮,它在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牵引着现代文学的走向。

关键词:民粹主义 现代中国 文学诉求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3-0074-04

20世纪初,民粹主义思想从俄国引入并与中国传统中的“民本思想”结合,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革命与救亡的危急情势下,迅速发展成一种澎湃的社会思潮。它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经发展变异,并始终潜隐于各种话语背后,作为“缺席的在场”,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在相当长的时期,民粹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隐在的然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确立,它在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边是知识分子地位的不断降低,由“化大众”滑向“大众化”;一边则是普通民众地位的迅速攀升成为创作主体,在此起彼伏的文艺运动的推波助澜下,对原本属于知识分子的创作园地进行包围和占领。

一、民粹主义的概念和来源

民粹主义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广义说来,“民粹主义”(populism)与这世上其他许多“主义”一样缺乏明确、严格、清晰的界定,这一术语在被众多政治家、知识者们反复援用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比它诞生之时远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它既指一种政治思潮、政治策略,又指一种社会运动,同时,它也指一种文化思想,一种文艺思潮。

学界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最初得名于俄国,它在19世纪俄罗斯的知识界曾盛极一时,虽然在其理论渊源上,朱学勤认为“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卢梭,不是俄国那批‘要做鞋匠’的青年军官和平民知识分子”^[1],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普泛的社会思潮和文化

思潮并进而形成“运动”,则无疑是产生于19世纪的俄国,具有一种政治纲领的性质。这时期一批被称为“民粹派”的知识分子“把俄国的村社制度理想化,肯定俄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2]。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到民间去”,他们“坚决地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土地那里去,到农夫那里去!农夫需要知识分子!俄罗斯需要有知识的人们组成的农村。那些走向土地的知识分子将在土地上为自己找到幸福和宁静”^[3]。

民粹派的理论观点有三个:一是否认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而通过农村公社进入社会主义;二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三是在历史观方面否定历史的客观规律,极大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极少数英雄人物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主宰力量。

民粹主义指的是一种文化思想、文艺思潮。中国的民粹主义影响从其一开始进入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就被紧密联系在民族命运革命前途之上,在整个现代文艺思潮中呈现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性动力机制态势,成为现代文艺思潮中潜在的又一话语体系,牵引着现代文学的走向。如果说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历程是以一种“百花齐放”的姿态出现,那么在30年代中期后,以左翼文学为“正道”的文艺发展方向便逐渐体现出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在4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工农兵方向”后,民粹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二、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诉求

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世纪末的文化论争,民粹主义始终潜隐于各种话语背后,它虽未正面登场,却又始终成为争夺对象和争相开掘的思想资源。这一资源贯穿于现代文学的始终,这一资源的开发者都是“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而当他们表达自己的信仰和献身对象时,却又同时诉诸于与精英主义相对立的民粹主义。

代迅在《民粹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一文中认为:乡村文学压倒城市文学,大众文学压倒精英文学,工农大众压倒知识分子,是现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重要特点,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它集中表达了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诉求。

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刻和持久的影响。李大钊是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和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先驱中有着鲜明的代表性;李大钊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倾向。他所倾心的革命俄罗斯思想,是一个由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互助主义和民粹主义所构成的思想世界。而正是民粹主义,激活和强化了李大钊思想中自早年留学期间起隐伏的日本式农业社会主义倾向^[5]。《青年与农村》是李大钊民粹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堪称现代中国知识界的民粹主义宣言,文中写道:

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社会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生活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

青年们啊,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里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

在现代中国,“民间”、“大众”、“民众”,这些词是有着特定含义的,其实质也就是指人数最多的农民,“民间文艺”其实也主要就是指农村文艺,解放区所倡导的“人民的文学”也主要是指农村文学、大众化文学。

杨春时认为:“民粹主义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主张绕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二是主张从民间文化和大众中寻求现代化的动力^[6]。这两个特征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中均有突出表

现。就文艺自身特征而言,从民间文学和大众趣味中寻求现代性,对文艺大众化的苦苦追寻,既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焦虑之一,也是中国民粹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个基本特征。到民间去,虽是民粹主义的口号,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提出“到群众中去”“到工农兵中去”,已经和民粹派提出的口号有着质的区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批判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加以发展和丰富而成。

在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看来,文艺是一种重要的武器,无需精致与华美,而是要方便实用,它需要的是社会组织功能,要能够强有力地鼓动接受者的政治热情;从审美风格来看,这是一种“尚力”的美学观念,体现在艺术形式上就是追求粗犷与质朴,这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完全一致,因而在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一以贯之。毛泽东关于文艺和群众关系的论述承继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并作出了自己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

三、民粹主义的文学诉求

这些文学诉求集中地指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关键词:大众化。文学的大众化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长期的重要话题,仅从1930年到1934年,就曾三度引发关于文艺的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国新文学的“大众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农村化,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村的区域和人口都是居于绝对优势。所以1928年前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以来,五四新文学运动便遭到了猛烈抨击,瞿秋白代表居于国内文坛主流的左翼文艺界,要求文学更为激进地沿着大众化的道路迅速推进。他在1932年5月撰写的《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采取了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失败,五四新文学和平民大众之间依然没有共同的语言,他断言: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交换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7] 391-392。

抗战爆发以后,五四新文学因其非大众化和非民族化再次遭到非难,被称为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适切的形式^[8]。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中国新文艺走向通俗,走向农村,走向更彻底的大众化呢?最初左翼文人主要集中在文学的形式上。瞿秋白关注的是语言问题,主张要重造大众语,进行“俗话文学革命运动”,认为这是普罗大众文艺中最为现实和紧迫的问题。郑伯奇

在《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中谈到“样式技巧的问题”时说：“大众所爱好的是平易，是真实，是简单明了。智识所耽溺的眩奇的表现和复杂的样式是他们所不能领略的……关于言语，大众当然爱好自己所惯用的言语。修饰雕琢的文章，为他们只是一种头痛膏。”^[7]^[368]

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家钱杏 大力崇尚反抗的、战斗的、“力的文艺”，贬抑轻盈、柔美的“抒情文学”，有意倡导一种粗暴、狂躁乃至粗糙的一种美学作风。因为在他看来，“力的文艺”乃是一种与优雅、精致、柔美、含蕴的美学风格相对立的另一种艺术姿态——粗暴、狂躁、奔放乃至“粗俗”、“鲁莽”的艺术姿态。钱杏 认为蒋光慈的作品就是这样，看似“粗俗、浅薄、鲁莽，句子不同，诗歌是标语口号”^[8]^[288]，实际上“是极热烈极奔进”的美学风格^[8]^[290]。但是经过中国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包括左联的不懈努力，大众化效果始终不佳，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究竟在哪儿呢？在俄国民粹主义的启示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转向自身寻找答案。

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影响，中国人做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历史抉择。由于俄国民粹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性，而中国人接受的恰恰是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这就使得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广泛地传播开来，并发展成为带有强烈中国色彩的新民粹主义。这种新民粹主义，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使得“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纯然的俄罗斯命题，在现代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共鸣和回响。

这条逻辑思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语境中逐渐演变成对知识分子本身的彻底否定，并形成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这样一条金科玉律。看过国产著名电影《大浪淘沙》的观众都不会忘记，电影中的最后结论是，判断革命的与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子的最后分界线，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这种外来的俄国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被纳入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是因为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固有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这使它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特点，并对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自然文艺大众化问题，也被纳入这个思想范式之中。

中国文艺的大众化问题，由此便从外在的艺术形式的层面进入到更为内在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层面。只要知识分子还坐在大都市的亭子间写作，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大众化，作家应当像俄国民粹派一

样，走向民间，深入乡村，这才是文学大众化的根本途径。文艺的形式乃是枝节问题，是末，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意识的大众化才是本，这也是民粹派的大众（平民）崇拜意识所必然得出的逻辑结论，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中有明显表现。潘汉年在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中明确指出：

我们这些出身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取得大众化作品的艺术形式与内容，不是凭空可以创造，一定要有大众化生活的实际，能做到，所以这里就马上关联着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者生活大众化的一个问题……谁要是反对或恐惧自我批判与理论斗争，他便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忠实勇敢的战士！也只有实行自我批判与理论斗争，才能克服与结算每个人一切旧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9]

这篇写于1930年的讲话，较早地而且明确地把文艺大众化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联系在一起，已经内在包含了后来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向工农大众看齐和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的极“左”思想的雏形，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以经典化的方式，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最后表述。毛泽东晚年搞“上山下乡”运动，推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以行政手段实施的一次大规模的民粹主义实践，而他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延安时期已经有了明确和系统的表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中国现代民粹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经典文本。毛泽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超越了文艺大众化问题中关于文学的体裁（如梁启超“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语言（如瞿秋白要求克服新文学语言的“欧化”）的艺术形式问题的考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直接附属于作家的主体意识，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他以一贯的简洁明快的风格写道：“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0]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是最彻底的大众化，这才是本；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其他文艺形式问题均属细枝末节，可以迎刃而解。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毛泽东现身说法，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例，阐明了具体的手段和途径，讲述了自己如何“根本地改变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的过程。毛泽东是这样描述的：“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思想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

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10]

这就是著名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改造”论,与此紧密关联的是,“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唯一源泉论’”要求作家“深入生活”论,可以认为这是现代中国革命文艺思想的三块奠基石。

由于毛泽东的不断增强的个人影响以及政权力量的介入,这些思想逐渐控制了整个现代中国的文艺思想。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精英态度和批判立场,以近乎赎罪的虔诚心理对民众顶礼膜拜,并不断进行自身的自我改造,而且这种“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思想又和中国儒家“一日三省吾身”的古老传统存在着某种契合。这样,中国文学便逐渐丧失了主体意识,为滑向后来的极“左”文艺思潮准备了必要的逻辑前提,终因在“文革”中被推向极端而使其逻辑上的荒谬性暴露无遗。

参考文献:

[1]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M].上海:三联书店,1994:

111.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俄国民粹派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
- [3]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M].曹葆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
- [4]李清昆,王秀芳.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3.
- [5]代迅.民粹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J].学习与探索,2003(6):91-96.
- [6]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169.
- [7]北京大学.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 [8]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2.
- [9]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391-392.
-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1.

·简讯·

河海大学启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气象-水文-水力学耦合模型洪水预报预警关键技术”课题

2007年4月24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气象-水文-水力学耦合模型洪水预报预警关键技术”课题启动暨技术大纲研讨会在河海大学举行。

该课题由河海大学主持,水利部水文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北京大学共同参与,重点就攻克气象-水文-水力学耦合洪水预报模型的关键技术展开研究。气象-水文-水力学耦合洪水预报技术是利用动力—统计定量降水预报技术,提供有较长预见期且具有一定精度的定量降水,并实现与水文—水力学模型的耦合,以提高洪水预报的预见期。借用专家的话,该项技术是当今气象学和水文学领域的“硬骨头”,但同时又是国家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所必需攻克的技术,课题实施任务重、责任大。会上,课题组就定量降水预报、致洪暴雨天气系统判别、气象-水文-水力学耦合等核心技术的实施方案、技术路线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征询了专家意见,明确了课题研究的重点。课题负责人同时对课题实施管理提出按计划实施、阶段评估、目标管理的要求。至此,该课题研究正式开始。

(本刊编辑部供稿)